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热议医药发展与用药安全话题——

让更多好药惠及患者

本报记者 吴佳佳

会内会外连线

如何保证用药安全？即将开展的新一轮目录调整将对我国医药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3月10日，在中国经济网主办的“2019中经医药两会沙龙”上，来自国家医疗保障局、工信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部门领导、全国两会医药卫生领域部分代表委员、知名医学和药学专家等各界人士共聚一堂，就年度医药行业重点议题展开探讨和交流。

3月10日，在中国经济网主办的“2019中经医药两会沙龙”上，部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和医药领域专家学者就医药发展与用药安全话题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吴佳佳摄

合力保障公众用药安全

近年来，用药安全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目前，我国临床药师缺乏，公众用药指导一时难以得到满足。”北京天坛医院主任药师赵志刚介绍，近10年来，医院、医生和护士的数量快速增加，药师的数量却在减少。一家药店必须有3名执业药师才能满足需求，但目前全国40万家药店却只有46万名药师，难以满足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临床药师和执业药师数量不足，是用药安全存在隐患的主要原因。为了最大限度保障公众用药安全，药师、企业和政府部门等社会各界必须积极合作。”赵志刚认为，政府部门要大力推进药师在用药安全中的作用，对药品实行合理、科学的管理，规范患者用药。对于“一老一小”等特殊群体，相关部门应明确药师调剂付费标准，减少医疗和安全事故。另外，相关部门和机构应适当提高药师待遇，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药师队伍。

用药安全问题在老年人群体中尤为突出。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老年健康服务业分会会长缪志华表示，为安全起见，建议老年人的用药要少而精，从小剂量开始，根据老年人病情对药品实行筛选。此外，行业协会、专家也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探索老年人临床用药标准和药品质量科普教育，为老年人用药提供规范。

在保障老年人用药安全方面，药企应该发挥积极作用。联盛药业董事长汪洪峰建议：“企业可以与一些专业机构开展合作，积极开展科普教育。提醒老年人从正规的医院、大药店选购药品，不要相信在街头兜售和到家里传销的商贩，也不能通过电话和健康讲座购买药品。此外，企业还应积极研发和创新老年人用药，助力老年人健康。”

医保应纳入更多救命药

今年国家将开展新一轮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因此，医保目录调整成为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一个话题。

“近几年是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老年人用药是一个大问题。希望医保目录调整能够重点关注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院长王建业认为，关注老年人的用药需求，可按年龄、层次分类研究，对于家庭贫困、残疾等级较高的残疾人，用于一般疾病治疗的药品应该进入医保目录，一些残疾人常用但多数人不常用的药品可以考虑加入医保目录。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吴相君表示，中药在重大疾病和慢性病防治方面有一些特殊优势。比如肿瘤病，最大的问题是转移和复发，根据临床证明，有一些中药能够抑制肿瘤内血管的增加，从而预防肿瘤的转移和复发。“在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过程中，希望可以多增加些疗效比较好的中药，可考虑医保费用多元化的支出模式。”吴相君代表说。

辅助性用药利润空间巨大，被社会诟病浪费了医保基金。谈及这一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董事长耿福能认为，辅助用药目录的出台对医药行业影响很大。去年底，国家卫健委宣布将制定全国性辅助用药目录。“该目录出台的一个重要指向是，让医生不能乱开药，促进合理用药。但原料药垄断、药价动辄上涨百倍等问题，还需要通过深化医改来解决。同时，还应建立对中医药临床价值的认可度，用更科学的方法来评判辅助用药。”耿福能代表说。

保障短缺药生产供应

部分药品短缺是全球普遍存在的难题。针对近年来我国多地发生的药品短缺问题，应采取怎样的解决办法？

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药品处副处长宋其森指出，生产端供应不足造成了消费端部分药品短缺，其原因主要涉及原料药垄断，生产车间、生产厂家工艺改造，生产企业较少，价格低，企业缺乏积极性，供需信息不对称等。

宋其森介绍，药品短缺从前几年的突发事件变为近两年的常态问题，国家各部门非常重视，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主要负责生产端的供应保障，近年来做了许多保障供应工作。目前，已经确定了两个批次7个品种药品生产，通过招标确定中标企业、供应价格和划定区域，发挥了很好的保障和稳定药品供应价格作用。

此外，国家还确立了小品种药生产基地建设，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建成5家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保证100种以上小品种药稳定生产和供应。宋其森表示，去年国家已确定3家小品种药基地，由3个企业联合体共同建设。今年还会再审批第二批小品种药集中生产基地。通过联合体可以很好地覆盖原料企业和上下游企业，整合产业资源，推动技术合作，保障稳定供应。

房地产市场在全国两会期间受关注——

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动摇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更好解决群众住房问题，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改革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保障体系，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和城镇棚户区改造，保障困难群体基本居住需求。

全国政协委员、房天下董事长莫天全认为，长期来看，一二线城市没有问题，但相对独立的三四线城市，也就是那些没有依靠大城市群的城市，发展空间会相对受限，要防止库存增长情况发生。

“今年应该会延续2018年下半年的态势，情况会相对好一点，但从价格来看不会有快速上涨或快速下降的情况发生，会比较平稳。”莫天全委员说。

全国政协委员、华润集团董事长傅育宁表示，房地产发展需要把握好节奏。房价不仅与人们的消费预期、财富效应有关，也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有关。总的来看，中国城镇化进程还在继续，房地产市场还有发展的空间。

全国政协委员、富力地产集团联席董事长兼总裁张力对今年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很看好。张力委员表示：“要保持定力，重在干好自己的事情。在业绩增长和风险中，稳是压倒一切的前提。”

莫天全委员认为，作为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城施策”正在发挥作用，该调控的地方仍要调控，“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会发生变化。

（本报记者 熊 丽 《中国企业家》记者 李 佳 李碧雯 李艳艳报道）

3月14日，人大河北代表团会议结束后，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林学院研究员郭素萍（中）同其他两位代表继续讨论脱贫攻坚话题。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金融力量

《农村金融时报》记者 孙金霞 张缘成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彰显了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与信心。完成脱贫攻坚任务，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全国两会期间，《农村金融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金融、工商领域多位代表委员。

解学智委员：注重金融扶贫效率

作为一家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在脱贫攻坚战中承担着独特的角色。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董事长解学智表示，2019年农发行扶贫贷款累计投放将不低于2600亿元，产业扶贫贷款投放力争达到扶贫贷款投放量的40%；“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扶贫贷款增速高于全行扶贫贷款增速；国家级贫困县分支机构实现扶贫贷款业务全覆盖。

对于做好政策性金融扶贫工作，解学智委员认为，必须坚持创新引领，持续推进金融扶贫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确保提升服务脱贫攻坚的能力和水平。同时，必须注重扶贫质效，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注重金融扶贫效率，有效防控金融风险，确保政策性金融扶贫可持续发展。

据介绍，近3年来农发行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1.75万亿元，2018年全年投放各类扶贫贷款3893亿元，扶贫贷款余额13466亿元。

郑之杰委员：复制推广优秀产业扶贫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表示，2019年国开行将大力实施脱贫攻坚“三大行动”，新增资金、新增项目、新增举措向“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倾斜，确保精准扶贫贷款发放力度不减。同时，将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做好符合要求的棚改续建项目贷款发放工作；大力开展助学助业，加大深度贫困地区助学贷款支持力度。

2018年，国开行发放精准扶贫贷款2668亿元，覆盖全国1118个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并在准入标准、贷款利率、信用结构、贷款期限和人员派驻等方面对深度贫困地区给予倾斜支持。同时，国开行连续两年召开开发性金融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推进会，与东部地区各级地方政府联合举办12场“开发性金融支持东西部扶贫协作在行动”活动，对接290家龙头企业，促成244个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郑之杰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应选取各地优秀产业扶贫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

孔发龙代表：做好脱贫后金融支持工作

“2018年，我们加大了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扶贫产业的信贷支持，已累计发放精准扶贫贷款206亿元，惠及贫困户32万户。”谈及去年的扶贫工作，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列举出一串数据。

孔发龙代表表示，2019年江西省农商银行将从四个方面做好金融扶贫工作。第一，继续加大扶贫贷款投放。积极沟通对接深度贫困地区在产业扶贫、就业扶贫和教育扶贫等重点领域的信贷需求，做到“应贷尽贷”。第二，创新推广扶贫信贷产品。结合各地产业发展特色，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发展。第三，保持扶贫贷款政策稳定。在脱贫攻坚期内，对已脱贫的贫困户继续执行现有扶贫信贷政策不变，确保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项目。第四，做好脱贫后金融支持工作，保障脱贫成效可持续发展。

周延礼委员：制定有针对性特惠措施

如何推动保险更有效地服务脱贫攻坚？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建议，要完善政策，强化措施。

周延礼委员提出，可按照监管部门统筹、行业主体落实的原则，以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为重点，落实《关于保险业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意见》等文件要求，在普惠基础上制定更有针对性的特惠措施，创新保险产品，以提高保额、扩大保险责任、减免贫困户保费等方式，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支持力度。

周延礼委员介绍，保险业已建立起三套功能作用协同配合的保险扶贫体系：以农业保险、大病保险为核心的保险扶贫保障体系，以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农业保险保单质押为核心的保险扶贫增信体系，以及以保险资金支农融资和直接投资为核心的保险扶贫投资体系。此外，要多形式、多渠道助推国家健康扶贫、教育扶贫、易地搬迁扶贫等战略的实施。

代表委员说

中国石油化工齐鲁分公司总经理韩峰代表：

防止油企“一窝蜂”式转型

本报记者 曹红艳

当前，我国炼油企业由“燃料型”向“化工型”转型已是大势所趋。炼化结构转型升级，固然是实现我国炼化行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一窝蜂”地投入资金、铺摊子、上项目也会产生副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总经理韩峰认为，要防止“一窝蜂”式转型，带来化工市场无序竞争，陷入重复建设、重复过剩、重复治理的怪圈。

数据显示，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炼油国。2017年，我国炼油总能力达到7.72亿吨/年，炼油能力过剩0.63亿吨/年。与之相对应的是，2017年我国乙烯产能达2455万吨/年，产量1824万吨/年，当量消费量约4250万吨/年，当量消费缺口2426万吨/年，消费缺口持续增大。“十三五”期间，随着新建石化装置陆续投产，乙烯产能年均增速约6.8%，2020年乙烯产能将达到3000万吨/年，当量消费量为4800万吨/年，仍有约2000万吨/年的缺口。

现实中，一些炼油企业存在基础建设薄弱、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健全、监督不到位等问题。韩峰代表建议，国家应统筹布局，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境外企业统一要求、统一标准，对高端产业、低端产业区别对待，该转型的转型，该并购的并购，该停工的停工，防止借转型之机“一窝蜂”上项目，掩盖了市场竞争力不足、创新能力不强、安全环保缺失等问题。“唯此才能抓住机遇转出高质量，转出新产品，打造新产业。”韩峰代表说。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代表：

扶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本报记者 马春阳

“在现代农业发展中，采用适度规模经营，可以提高亩均产值、提高产量、提高农业效益。”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表示，扶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对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有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现代农业的发展，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与大规模、现代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已经不匹配。”赵皖平代表指出，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各地可采取适度的规模经营，以现代农业体制激发生产活力。

赵皖平代表建议，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训，提高对农业规模经营未来发展的信心。稳定农业规模经营周期，让规模经营户愿意并且持续投入农业。

赵皖平代表还表示，应健全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服务组织，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引导和支持承包经营权向新型经营主体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做好组织、引导和扶持等工作，帮助规模经营户组织起来，参加专业合作社，重点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化企业开拓市场，为他们提供优质服务。”赵皖平代表在谈到发挥农民合作社作用时说。

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董事长安庭委员：

提升文旅产业要注重“原生态”

本报记者 熊 丽

重物质遗产、轻非物质遗产，重经济价值、轻精神价值，拆真建假、拆旧建新……当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工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比较突出。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希肯国际文化艺术集团董事长安庭对此一直高度关注，“我国文旅产业已进入转型发展重要时期。在过去较粗放的发展历程中，依靠大量复制，甚至‘伪造’文旅项目赚取收益的方式已渐入末路”。

什么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的核心价值？安庭委员认为是“原汁原味”。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原生态是文旅产业的“绿水青山”，产生的消费价值就是“金山银山”。

北京故宫文创产品的成功具有借鉴价值。安庭委员说，放眼全国，有许多与故宫类似，拥有“原汁原味”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同样具备独特的“非复制性”。坚守本色，发掘自身无法被替代的个性品质，才是吸引消费者的核心价值，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他建议，保护“原汁原味”的原生态生活方式。在不影响建筑及格局的前提下，通过政策或立法维护“原生态居民”比例及其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划定核心保护区，与后开发地区形成严格的缓冲区。

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杨帆代表：

促进数字与实体经济融合

本报记者 温济聪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杨帆表示，数字经济将很好地驱动经济增长、提高劳动生产率、培育新市场和新增长点，世界各国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重要战略选择，我们国家也不例外。目前，我国的数字经济已经进入了体系重构的新阶段。数字经济正与实体经济加快融合发展，这种融合，正加速由消费领域向生产领域拓展。以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等为代表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正在推动以分享经济为代表的福利型数字经济发展并推动社会治理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过去政府单纯监管的治理模式加速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式转变，让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智能。

她认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融合发展，首先应加快建立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立法保障体系，让数字经济发展有法可依。其次，建议加快成立国家大数据应用发展管理机构，更好地指导各省区市大数据管理机构工作，形成自上而下的大数据智能化发展合力，更好地助力我国实施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和数字中国建设。此外，建议从国家层面倾斜更多的政策、资金、项目、技术等资源，支持重庆创建国家大数据智能化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